

走向世界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

——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靳润成 副主编 宫宝利 毛 曦

ZOUXIANGSHIJIE DE ZHONGGUO LISHI DILIXUE

2012 Nian Zhongguo Lishi Dili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走向世界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

——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靳润成 副主编 宫宝利 毛 曦



ZOUXIANGSHIJIE DE ZHONGGUO LISHI DILIXUE

2012 Nian Zhongguo Lishi Dili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2012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靳润成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4027 - 7

I. ①走… II. ①靳… III. ①历史地理学—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3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44.5
插 页 2
字 数 1028 千字
定 价 1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论中国历史地理学时空范围的拓展与分支学科的创建	黄盛璋 (1)
走向世界: 对于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考	毛 曦 (11)
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再议	李并成 侯文昌 (19)
论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尺度问题	苏海洋 (25)
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中民族因素相关性的几个问题	娜 拉 (35)
China through Italian Eyes: Geo - Historical Themes in the Travel Report by Giovanni Gherardini (late 17th century)	[意大利] Stefano Piastra (40)
日本历史地理学研究: 1977—1986	
——以《地理学文献目录》为核心的考察	潘 晟 (47)
早期九州说的思想史脉络	田 天 (70)
《禹贡》不仅是地理志之祖	
——历代《禹贡》研究与地理研究的关系	王小红 (85)
陆游川陕诗的历史地理学意义	马 强 (95)
值得重视的宣统《重修泾阳县志》	吕卓氏 (104)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编制与国际反响的科学社会史考察	张九辰 黄荣光 (110)
《清代乾隆河南黄河河工图》考释	王志刚 (116)
炎帝部族与涿鹿之战地理新考	周运中 (121)
定县北庄汉墓墓石题铭相关问题研究	马孟龙 (135)
盛唐“平定河北之役”的历史地理考察	穆渭生 文 嘉 (144)
清代燕赵地区民风初探	陈新海 (153)
元代以来京津唐地区环都文化与都城文化的空间关系与地域分异	尹国蔚 (164)
天津直辖市地域的清代地理沿革	
——新修《清史·地理志》天津相关部分	华林甫 (171)
天津聚落的演变及城镇体系的形成	李兆江 (185)
明代天津的游击将军	肖立军 (196)
太行两翼是通道	
——兼说太行通道对北京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保春 (201)
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清代北京周边森林植被	孙冬虎 (208)

清代密云八旗“满城”时空演变探析	朱永杰 韩光辉 (217)
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重组的政治因素	张利民 (225)
近代环渤海经济一体化简析	樊如森 (233)
旱域水潦：明清黄土高原的城市水患与拒水之策 ——基于山西 12 座典型城市的考察	李 嘎 (246)
试析政治地理因素对杭州“西溪”地名含义变迁的影响	范今朝 刘姿吟 (267)
汉代司法管辖制度与政区地理	闫晓君 (277)
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政区沿革	魏俊杰 (284)
北朝时期“河曲”地域行政区划建制的演替	艾 冲 (296)
隋唐桂州理定县考	江田祥 (314)
唐初左右江地区州县建置及其历史意义	郭声波 (321)
五代时期荆南（南平）政权辖境政区沿革考述	李晓杰 (332)
元代安抚司的演化	陆 韧 (340)
“界”的动与静：清至民国时期蒙陕边界的形成过程研究	王 晗 (357)
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的道路与城址考察	李孝聪 (370)
关于武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论述	朱士光 (385)
历史时期彭阳县治所变迁概要	张多勇 (394)
金代城市行政建制探讨	韩光辉 刘 旭 吴承忠 (412)
行政区划与明代青岛“走私港”的形成	李玉尚 (418)
清代（1840 年前）琼州府的港口分布与贸易初探	王元林 (428)
清代江南市镇的“夫束”组织	于双远 (445)
从筑城到拆城：近世中国口岸城市成长扩张的模式	（台湾）刘石吉 (449)
从《楚居》说“丹阳” ——兼论半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	徐少华 (462)
清华简《楚居》所见楚人早期居邑考	杜 勇 (471)
《楚居》“京宗”地望辨析	尹弘兵 (486)
西汉秦中祠疏说	辛德勇 (493)
庄浪群众烧柴小史 ——对当地植被生存状况的初步揭示	侯甬坚 (497)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与经济社会变迁 ——以宁夏固原为例	薛正昌 (509)
古典文明中的地理环境差异与政治体制类型 ——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之比较	李学智 (519)
古希腊民主制形成的人文地理环境成因	汪 兵 汪国风 (535)
试论地理环境对我国社会形态演进的重大影响	高永丽 (542)

历代对海南岛的经略政策与岛上环境变迁	司徒尚纪 许桂香 (554)
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	朱海滨 (562)
欲速则不达: 江南乡村地区饮水改良分析 (1952—1978)	梁志平 (581)
台湾乡村环境景观变迁研究: 以桃园地区为例	(台湾) 廖慧怡 (594)
壮族地区特色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刘祥学 (608)
从入迁到外流: 清代镇番移民研究	潘春辉 (618)
高陵十三村回民聚落群与清代关中回民人口分布格局	路伟东 (629)
清代河南省农业人口职业选择的人文环境: 地域习俗的制约	邓玉娜 (641)
明末中朝之间海上通道研究	张士尊 (647)
战时台湾兵力的大陆补给与投送	
——以林爽文事件为例	李智君 陈 静 (657)
男逸女劳: 岭南经济民俗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范玉春 (679)
明清时期广西瑶族地理分布的变迁	郑维宽 (687)
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2012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毛 曦 靳润成 (698)

论中国历史地理学时空范围的拓展与分支学科的创建

黄盛璋

一 绪论

历史地理研究最早始于中国，原和历史研究合一不分，后被作为史学四大开门钥匙之一，为其分科。何谓“历史”？笔者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历史”，是指人类改造自然，进入与自然不同的世界，即人类文明史；从人类改造自然、出现文明开始，产生食粮被称为“农业革命”，表明人类改造自然最早成立，故成为文明的决定标志，所谓历史就是文明史的起点。最新发掘确定：中国最早陶器距今为 20000 年前，水稻为 12000 年前，都是世界最早，中国文明持续发展至今，世界绝无仅有，早成共识。产生食粮的农业革命就是文明史即历史成立之始，中国早于世界，已确证不移，就不是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是上加两倍，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间空间都要随之开辟，就要开创新的理论、方法、道路，尽管是长期的研究，但是问题多而大，对中国当前与今后都有很大影响，从现在开始，就要研究如何推进。

文明是人类的最大成就，文明史为历史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历史地理学研究只是文明史之一部分，即天、地、人之中的“地”，而以人为主导最大动力，地（即自然）为发展基础，也要利用天时、天文历法，不是单纯的地与人，而是人与地结合，形成人地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产生各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改造自然、产生食粮成为文明成立与文明史起点的标志。中国栽培水稻为公元前 10000 年，粟黍稷也相差不远，都是世界最早，就不是五千年文明史，或文字记载加历史传说的历史，而向上增多两倍，这一部分历史在文字使用前，被称为“史前”，长期研究限于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时间从何时开始？根本对象研究什么？过去不明，无法改进。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笔者长期承担国家历史边界边疆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绘，多次到新疆、河西考察，提出建立民族历史地理学和绿洲学与西域学研究，主办《亚洲文明》，本文将笔者数十年研究实践积累经验教训，为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间、空间、论题与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道路抛砖引玉，多望匡谬补缺，共同前进。

二 历史地理学应重点研究中华文明探源中“地”的问题

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国家重大研究，已进行十年、四次，第一次为预研究，第二次探源时间为公元前 2500—前 1500 年，第三、第四次皆为公元前 3500—前 1500 年。新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头就一再说明，最早定为公元前 3500 年就是为论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否可信，取得众多重要成果，应予肯定。但是要求明确是“探源”，现探出大都是流，很多距起源还很遥远，时间为 3500 年前的两倍，无法求到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经过，中国持续发展的文明，缺了最少 2/3，探源是求最早起源，如非最早就不是源，改为探中国五千年文明，严格地说就是偷换概念。

造成如此失误，首先就在于缺乏历史地理学的认识，而又不研究，排除于外。中国文明西来说最早发起于欧洲，经历三四个世纪，数经改变，西来说在国际上仍居主要地位。1966 年，国际汉学代表蒲立本刊登《吐火罗语与汉语》，首倡公元前 5000 年，吐火罗语与汉语同源、同祖，前 2000 年，分为两支，一支到印度，成为印度梵语；一支到新疆焉耆、龟兹，就是汉语来源。各国都有赞同者出版论著，包括中国，成为当前最大西来说与最新学派。由于中外存在重大争论，所以要探源查明，包括中外，都要拿出真凭实据。连对西来说起源年代也不明，不能对其专门研究，无法说明西来或外来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考古发掘限于微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宏观的指导理论造成的根本失误。

据最新发现：中国陶器出现早到距今 20000 年前，水稻 12000 年前，粟黍稷至少 10000 年前，都是世界最早，中国最早进入人类文明史，无一古国能与其比肩并立。明确规定探源，而改为探五千年文明，何源之求？文明探源，除时间问题外，就是“地”的问题，包括地区、地点、城、邑，国家与其人民（部族）分布，都属历史地理学的范畴，而非其他学科专业所能取代。探源工程作为重点研究，“时”与“地”之源都未能探出，考古学专业主要为发掘，很多是不能或难以发掘出来的，因此有关学科都有探源责任。上述属于地的问题，源多不明，限于公元前 3500 年，源无法求，地以人为主导，而产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地就是文明依存与发展的根本基础，仅次于天，至今地除历史地理学为专业研究外，还没有其他学科取代，我们责无旁贷。探求中国文明最早之源，追查到底，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重大责任，大量地源研究等待进行，我们能为中国和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地”上与天对，就是自然，称为“大地”，地理学研究为狭义地理，地理科学皆研究现代，分为多科，对象更为褊狭，无一专研大地学科，只有历史地理学，从 1956—1957 年，笔者奉命筹备世界最早的地理所历史地理研究组，“建立中国特色的历史地理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是先师竺可桢面交的两大任务，成为笔者的重大责任，必须完成。集数十年实地考察与实践研究，深知关键：一要提出指导研究的

新理论；二要利用新方法、技术、测验手段；三要开发新资料来源；四要创建新分支学科，这些都必须通过实地研究，不断总结上升，利用考古学发掘研究，历史学史料考据，地理学与地图学遥感和实验分析新技术方法，创建宏观和微观合一的历史地理考古学。目前考古发掘勘察还很有限，中国既是亚洲最大陆国，也是最大海域国家，但发展较晚而被西方殖民侵略和东方日本军国入侵，首先从海上落后，变为穷困衰弱，笔者已筹措十年，拟创立“中国海学新学”，将郑和开辟的海路、海船、海港、海贸、海侨，发展上升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西域与南海相对，干旱地区唯一绿洲可以居人、生活、生产，世界绿洲大多衰落、消灭，唯有中国绿洲发展居世界之最，笔者多次到新疆考察绿洲，出版《绿洲研究》在中国先行研究，创建绿洲学，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

三 中国早期文明新发现为文明起源与有关学科研究提出新思路

产生食粮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成为文明成立决定性标志与文明史即历史开始，区别自然世界，进入历史时期，而与人类史、自然史、地质史、生物史等学科明确分界。利用新石器工具耕种，考古学称“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在冰后期，大暖期开始的全新世，过去通认为约1万年左右。中国最早栽培水稻为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与湖南道县玉蟾岩的先民，20世纪后期发现后，就进行多次发掘、研究，并请水稻权威专家反复鉴定，皆有栽培水稻植硅体，“确实是该遗址文化层时期遗存”。1993年、1995年、1999年，中美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五次对仙人洞进行发掘，当时因陶片取样受限，碳14年代数据的样品和陶器的关系不准确。2003—200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又对玉蟾岩遗址系统采取碳14年代样品，结合地层沉积微结构分析，确定距今18000年，发表于2009年PNAS杂志。2009年，又在重新清理仙人洞遗址剖面上，用同一方法、措施，确定陶器距今20000年，由北京大学吴小红、张弛教授发表在世界权威杂志《科学》（2012年6月28日），《北大文博》有最新报道，同年8月《中国文物报》全文转载，据称进一步研究了陶器最早使用等关系，水稻关系年代，文未说，问题复杂，需要研究，但陶器20000年与18000年反复检验确定，笔者请教考古所专研此问题名家，确定水稻距今12000年，可信。两处陶器与水稻年代基本明确，就是突破性新发现，其他研究结果刊布后再讨论，先就已知事实阐明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1928年和1936年，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一再提出“新石器革命”，将陶器出现、栽培植物、驯养动物作为新石器时代来临的标志，认为新石器时代最早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1960年，布雷伍德“农业革命”取代“新石器革命”并加改进，提出两河流域古文明农业最早起源于其东北扎格罗斯山地的“新月形沃地”，公元前5500年普遍废弃，而后变为与南部两河流域文明同步发展，不再存在。据西方最新研究，西亚农业社会可追溯到距今11500年，直到9000年前，才出现陶器，欧洲常有无陶期，可晚

于农业生产一两千年。中国烧造陶器在新石器前,最新公布江西万年县仙人洞与湖南道县玉蟾岩陶器,分别为距今20000年和18000年,皆为旧石器末期晚更新世,而都有栽培水稻,但都没有陶器早,陶器不是新石器时代标志。陶器最早烧造,还没有水稻,但是必须与定居生活有关,为何烧造?做什么用?也不能与盛饮食器无关系,都待再发掘研究,两处水稻都是栽培约公元前1万年,笔者坚持中国文明起源中原本土论,但和原属中亚边区分开,特别是新疆与甘肃个别地方冶金铸造铜及铁器。历史地理学研究人类历史文明,而以农业革命为起点,必须从文明出现开始,坚决不同意按“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探源,至公元前3500—前1500年,而要以公元前10000年栽培水稻产生食粮的农业革命进入文明史即历史之始。中国不仅早于世界,水稻与粟黍稷都是一直持续发展至今不断,农业起源世界范围尚未能解决,成为各国文明起源重大问题,都在不断探求。中国也有许多起源问题,也要作为重点,农业是最早出现、成立的文明,人类改造自然首先成功而变为文明世界,就是以地为基础、人为主导产生解决饮食生活必需的物质文明,地是根本,就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的重大任务。

中国长期被认为文明晚于西亚两河流域与北非埃及,所有西方出版的世界史与有关中国上古史论著,大都按此说法。16世纪欧洲东来亚洲殖民贸易进行经济掠夺,土地占据使中国从海上开始日益落后于西方,贫穷衰弱,从而被鄙视。中华文明西来说始于欧洲,1654年德国基歇尔(A. Kicher, 1620—1680)于罗马出版《埃及之谜》,首倡“埃及殖民中国”,经历三四个世纪,来源地区、时间、说法虽有不断变改,但是外来说特别是西来说,在西方至今仍占主要地位。考古学很晚自西方传入,而与世界文明史对比研究,更晚而落后于西方。但是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和其他有关科学研究取得很多重大发现,证明中国文明起源有不少不仅比西方早,而且居世界领先地位或和外国不同,考古遗址、遗物表现的文明尤为显著,取代、改变旧说,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目前其他学科尚未解决,应是我们历史地理学义不容辞的专业研究任务。

中国最早产生水稻的“农业革命”,开始进入人类文明史或历史,而比世界公认最早的埃及与两河流域最古文明要早几千年。西方史学界长期认为两河流域文明起源最早,成为旧大陆各地之冠,所以都起源于西亚,包括中国。以研究文明著称的汤因比晚年一直坚持将世界发展史分为四期:第一期文明中心为西亚两河流域;第二期为16世纪到二战前,中心为西欧殖民帝国;第三期是二战后,中心为美国;第四期为今后发展,中心是中国。中国文明不少起源时间最早,特别是产生食粮的农业革命的水稻与粟黍稷彻底否定了中国文明来源于西亚。

笔者提出中国文明五大特点:一是独立起源;二是与西亚平行发展;三是有中国自己的文明体系;四是有自己的文明传播地区;五是持续发展,世界绝无仅有。所以创建“东学新学”,与西学对峙,历史地理考古学作为其下分科,用于研究实践,其中直接关涉历史地理学研究众多问题,另撰专文,此不赘述。

四 文化、文明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与价值

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史，从改造自然成立文明开始，但何谓文明？从 19 世纪后期起，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解释定义都多达一二百种，常互用不分、观念混乱，直接关系到研究什么？有必要予以明确。

(1) “文化”、“文明”二者观念、称谓，最早都源自拉丁文，后为欧洲英、法、德等拉丁语系沿用，原意不断扩展、改变。“文明”源出拉丁文的 *civis*，“文化”源出拉丁文 *cultura*，直到 19 世纪中叶，还常为同义语。此后混乱，1871 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最早解释：“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之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这里已具有多种用义，混淆不清。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合著《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指出，从 1871—1951 年的 80 年间，文化的定义至少有 164 种，而与文明互混更数不清，无法统计。1992 年，笔者在《亚洲文明》第二集“代序”中，针对中文多按西方观念混用文化、文明概念的情况，溯流穷源，重新界定，作为“东学新学”新说，清除西方文化、文明的观念混淆和定义纠葛。

(2) “文化”本义与纯自然相对，人为对自然加工改造，改变成为各种不同形状，脱离自然状态，成为最初的文化，而为形成文明的基础。文明本义是与野蛮相对，最早是由不同时起源的文化汇合于一，提精荟萃，成为精华，上升到相当历史阶段，形成文明。文化未提炼，可以是糟粕，而文明只能是精华。二者不同，简括地说：一是有简单与综合的差异；二是有低级与高级的区别；三是有粗放与优化的不同。例如中华文明是由各地区、各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汇合成为文明的长河，文化为其支河，文明用为总称，包括文化；文化在其下一级，不能包括文明。这是相对的区别，单独一字较难分辨，一般混用，字典也混注互注。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文明史，是已形成的综合文明，不是未形成的单纯文化。

(3) 汉语“文化”、“文明”对译西文，笔者早指出最早非出汉译，近年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中国晚清民初所译，并发表一些专著，分析先后用法与字义发展演变，甚至把《易经》与《尚书·舜典》中所用“文明”也都收入讨论，认为古代中国“文明”一词，与现代西方所使用文明概念的基本含义具有某种相同之处。但是按照晚清中国（或传教士）出版编译的欧语字典，日语早有“文明”（ブンメイ）、“文化”（ブンカ），“文”读ブン（ben），“明”读メイ（mai），“化”读カ（ga），都是唐音，来自中国古籍，很早就进入成为日语。但是日本最早编译西文英、法、德等语字典，源出拉丁文 *civis* 译注为“文明”或兼注“文化”，*cultura* 译注“文化”，包括其名、动、形词性，都不用上述唐音日文，证明使用“文明”、“文化”，日本早于中国。

(4) 《易经》中“文明”不是也不能含有西方文明某些意思。《舜典》的“文明”完全套用《易经》，它是东晋梅颐所献伪古文，宋以来研究者考为伪作，至清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经乾嘉学派验定成为定论，最新发现清华简《尹诰》就是伪孔传

《咸有一德》，而与之完全不同，《舜典》“文明”一词出于伪作，铁证不移。有人引清初李渔文证明中国古书“文明”，也有近似西文“文明”之意，《易经》的“文明”，两三千年都已不用，李渔文中的“文明”与《易经》没有关系，他不懂拉丁文，当时西方“文明”、“文化”尚未成为固定的概念，传教士也没有将之传入中国，有关论著并未使用“文明”或“文化”字样，不管怎样说，和西文“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凭此一根稻草，证明中国古代也有近似西方“文明”的概念，妄牵是研究大戒，笔者不能赞同，另有专文详论。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文明史研究在当前仍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史，是人类将自然世界改造改变成为人类文明社会，是人类的最大成就与精华会聚的结晶，历史就是由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传播、兴衰等全过程组合起来的。总之，文明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人类长期劳动创造集中的结果，没有它，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以至今日，作用之大无须多说，但是因有地区大小、时间早晚长短、成就多少等而有差异，还需要有上述比较标准，以为衡量区分。

(2) 世界文明古国从四个最大最多到九个最大都有中国，而犹太、阿拉伯和新大陆某些较晚古国尚不在内，时间早晚成为一个主要因素。过去曾以埃及历法、文字等起源早于他国，作为世界最早文明古国。后又以两河流域文明在前，为世界最早，旧大陆其他古国文明都是来源于此处，包括中国在内，以考古学家柴尔德为代表力主此说，而为西方考古学家、世界史家所赞同。以研究文明闻名于世的汤因比，以《历史哲学》巨著作为定论，直到1976年死后出版遗著，分世界文明发展为四期，第一期就是以两河流域文明为世界最早起源发展中心，中国虽被定为四大或九大文明古国，但是一直被认为晚于两河流域和埃及，甚至晚于古印度文明。据最新发现，中国陶器最早为距今20000年，比西方至少早10000年，烧造陶器必须定居，出现原始农业，用于饮食器，人类改造自然开始，而为最早文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不能作为标志但是不能与定居生活无关，考古发掘者对此尚在继续研究，未做解释。笔者按历史地理学研究，提出如此推断，姑妄言之，尚待发掘验证。不管怎样说，这是中国最早改造利用自然的重大成果，世界无可能比，成为中国先民的重大突破。

(3) 2011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把文化强国作为发展国策，长期施行。而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海军舰队60%和自阿富汗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近10万，全部派驻于亚太各要地以维护、巩固其世界霸权主义与霸主地位，长期不变。其视中国为最大敌手，希拉里四处奔走中国周边诸国，阻遏中国崛起。美国东进亚太主要依靠海、陆、空军和核武器，控制亚太海路，防阻中国海上发展，将长期不变，无法躲避，我们对此必须从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做好准备，海上建设尤为关键，有文有武，两手进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以文克武，中国长期用文化优势之力，成为世界强国，获得显著成功，成效很大，已有历史证明，现定为发展国策施行，以文兼武应对美国东进亚太，实为上策。

(4) 文化强国，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求与方向，具体如何实施是问题关键。历史地理学应以其作为重大课题，有关研究者要发挥所长，而为国家需要贡献力量。美

国东进亚太直到中国家门外海的南海、东海，为阻遏中国崛起，联络东盟诸国某些国家，支持向中国声索海岛。当前日本掠夺钓鱼岛、菲律宾占黄岩岛与中国对抗，都是依靠美国为其后台，美国给予军备、经济等支援，造成亚太沸腾。根子在于美国东进亚太，如何切断它还要多方面措施，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综合应对不能单靠一种方法。而应对美国，应该有专门研究及对策。

(5) 美国保护其世界霸权与霸主地位战略不会改变，特别是其新的亚太战略，使得中国南海、东海难有宁日。南海、东海，西方曾称为“大明海”、“大青海”及“中国海”，其中许多内容可以将其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要为国家分忧解难，贡献力量。对此，历史地理学的专门研究不能熟视无睹，需要作为专门与长期的研究计划，而尽我们应尽责任。关于详细讨论，拟专文述及。

当前中国文明求源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是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干，附加部分为上古史研究。考古学特长为发掘，无可代替，应作为重点研究，但发掘限于微观与点，文明与其发展都属宏观，例如“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就是宏观之面，难于或不能发掘。历史地理学研究贯穿古今，重在宏观，综合考察，与细部分析合一，微观与地理之点定位、定代，常要利用考古学发掘，所以需要创建历史地理考古学，微观与宏观合一，从最早出现文明开始。文明求源只到公元前 3500 年，就是将中国文明史全过程拦腰斩断，仅留下身，头已不在，还求什么源？没有最早文明，起源丢掉，最早来源时地不明，缺乏历史地理认识与研究，造成对中国最早文明无知。这是历史地理考古学的根本任务，没有它的参与，有关难题难以解决，所以应以其作为重点，彻底查明中国文明之源。

中华文明探源是重大学术问题，有关学科都负有研究责任，以某一学科为主办，不能解决其他学科研究难题，考古学研究可以作为重点进行，但是微观与点的发掘，诸多问题发掘不出，微观之外看不到，不能自知，不能自以为得。笔者在《亚洲文明》第四集的《“东学新学”文明求源百咏（代序）》中指出：考古发掘限于微观之点，当前存在十大误区，一半以上都是考古研究造成的。为此，创建历史地理考古学，二者互助，取长补短，匡救彼此缺陷，而以人主导地即自然改造，形成人地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创建此学的指导理论与方法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创办《亚洲文明》，会聚有识之士，共建此专门独立学科。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为中国文明史全过程，从起源开始，经形成、发展、传播（时间、地域），就是从农业革命产生文明开始，直到衰亡。当前中国最早文明求源，就是历史地理考古学根本研究任务，至今被排除于外，对中国文明求源造成很多损失。其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历史地理考古学认识，而又排除其研究，历史地理学不仅可为中国文明求源，也可为世界文明史重大问题研究做出贡献。

五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程及特征

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都是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学科，历史学研究从人类原始社会开

始,历史地理学研究要从农业革命出现文明开始。使用新石器工具耕种,就是其时间起点,而不是文字记载加上传说的四五千年的文明史,研究时间拓展至两倍,内容与问题等都随之增加多倍,为此必须开创新的分支学科分别进行研究,都需要有理论、方法指导完成。总之,这是长期的、多学科、多人、多课题研究的艰巨任务,关键在于“实践出科学”、“万事起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遵从中国古老格言,立即起行,迎头赶上。

历史地理研究起于时间发展引起的地理上地点与地名变化,越久变化越大。中国文献丰富,历史地理研究最早,开世界之先河。《禹贡》就是以当时地理作为基础,上溯最早建立国家开创者夏禹之时的自然山河土壤分布,政区九州划分,与其人民、部族分别和生产、交通、贡赋等经济地理,被中外推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之鼻祖,实属战国儒家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理想复古的地理著作。真正历史地理学研究开创是在西汉后期,《汉书·地理志》说“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分》……朱赣条其《风俗记》”,又说“地名又数改易”,成为历史地理问题表现最为明显的问题,时间越久,改变就越多越大,不是靠人的记忆所能解决,最重要就是寻找证据,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最早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向著《域分》就是国土疆域变迁需要讲明,最早沿革地理;朱赣著《风俗记》就是各地民俗异同变化,地方史志的前身,而后为历代继承、改进、发展,产生历史地理大量著述,世界无可比拟,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遗产丰富,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皆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铺垫基础,历史地理研究成就众多,世界领先。历史地理学发展由简单到复杂,最初与历史学合一研究,作为历史学四大门钥之一,与历史学总称“史地之学”,实际上尚未成为独立学科,大量皆为历史叙述,缺乏上升为理论的方法论,关键就在限于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由于记载的有限性,我们的认识仅为文明史或历史之后小半部,其前大半部文明史都只能付诸阙如。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只能依靠文字记载和历史传说,无可厚非,其他已经逝去的文明,越早越难找到遗存,资料与方法限制了人们认识的程度。

考古学兴起之后,地下材料日益发现增多,其他有关现代科学如水文、生物、土壤、森林、水利等,以及测验技术和先进方法不断涌现,到了20世纪,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历史地理学研究不能再仅仅延续依靠文字记载与历史传说的资料和方法,时间与空间必须开拓,首先就是时间上限,随之就是空间地域,要依中国历史实际不断发展。1954年,中国科学院筹设地理研究所后,筹委主任竺可桢调笔者筹设历史地理组。1956年,竺可桢先生面谕两条:一是创建现代科学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做出应有成绩。直到1988年退休,都由笔者负责地理所历史地理组的研究工作,任务主要由上方交办限期完成,最大有两项:一是历史边界、边疆研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地图编制。前者每年不断下达,必须按要求完成,大多不能公开,新疆成为重点,为此笔者多次实地考察,并和彭加木横穿干无滴水的罗布荒原,最后步行进入没有生命的死都楼兰古城,从而获知它位于楼兰海口三角洲上,屯田汉人不惯胡语,而用汉语称为海头。王国维认为名

为海头就不是楼兰城，他从未到此，以为此城则在东北隅，而与《水经注》记在西北不合（《流沙坠简叙》），实则就是在其西北。

六 历史地理学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拓展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文明”与“文化”皆源于西方，中文中的“文明”、“文化”都是转自日本最早译名，不是中国原有。最早《易经·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同书《贲》“文明以止，人文也”，包括古籍屡用之“文化”，与今日观念根本不同。对此，应予明辨。文化的本义是和纯自然对立，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人为对自然加工改造，改变原状，与自然区别，成为人工生产品，称为文化，它是文明形成的基础；文明则是一些来自各处文化会聚发展上升到相当高度，脱离野蛮状况，进入与野蛮不同的文明世界。考古证明：野蛮时代可以有各种不同文化，尚未进入文明，文明世界就不能容有野蛮。文明在野蛮之上一层，就是一些文化综合与取精荟萃，上升为文明。中华文明就是由各地区、各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汇合而成的长河，由主流、支流或岔流组成。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总起来说就是这一中华文明长河，文明包括各种文化为其形成、组合成分与基础，但是文化不能包括文明，不能反过来，而西方的“文明”、“文化”被纠混成为乱丝，至少表明西学在文明研究这一点上的停滞不前。笔者曾在《亚洲文明》第二集《代序》中提出创建中国“东学新学”以与西学对峙，就是从分析西文“文明”、“文化”混乱开始，匡谬补缺，以为中国文明研究“开端发轫”，并结合当前需要寻求新知。

历史学研究文明史始于原始社会与以后发展，仍以文字记载史料为主。考古学研究历史遗址、遗物，包括旧石器时代，大多在历史文明之外。至于历史地理学，过去研究时间如历史学，对象为地理，究竟属地理科学或历史科学，皆有主张，越早越缺乏地理史料与研究方法，现虽加用考古发掘遗址资料，但仍然非常有限，很多没有或不能发掘，一般只能为文字记载加历史传说，要前进就必须改变、改进。研究对象是天地人之地，要以人为最大主导动力，地为利用基础、依存载体，产生人地关系，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决定前进的方向道路。以农业革命为起点，拓展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范围，并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建。

文明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直接关系人的生活、生存与发展，不能偏废。物质文明主要是利用、改造自然，产生农业、畜牧业，是人类生存、生活的根本依靠。最初为采集、游牧，直到产生食粮，表明改造自然开始成立，出现与自然界不同、对峙的另一世界，称为文明与“农业革命”。中国栽培水稻世界最早，并沿长江上下持续发展而遍及中国上古各地区，后更成为世界广泛食粮，通用至今，持续不停。

中国北部黄河流域黄土地带是最早栽培粟地区，太行山东麓的徐水南庄头、北京东胡林、燕山南麓的转年三处新石器遗址，是迄今已发现的公元前 8000 年左右粟作（粟黍稷）农业地区。稍后分布更为广泛，黄河裴李岗、磁山，山东后李、西辽河、大凌河及燕山北麓兴隆洼等新石器遗址，都是粟黍稷生产区。一般认为：粟原产地为中

国，向北发展传到朝鲜与日本，辗转传到各国。1985—1986年，中科院遗传所李璠教授在甘肃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发现多种粮食碳化籽粒，论证普通小麦、普通大麦中国为产生原地，向外发展、传播。最近，李水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早期麦类作物》将中国境内所出和西方对比研究，认为在西亚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南欧希腊克里特岛所发现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普通小麦，是经新疆、甘肃传入，可能性较大，笔者以为如此之早，根本不可能。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与西方根本没有交通往来，也无法数万里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越过号称天险的帕米尔高原，无法进入新疆，甘肃更不用说。农业起源可以多元，不能只一个地方，现已有很多证据动摇了一元说，中国大、小麦起源还有待更多证据，未发现前，都需要不断地研究探溯。

物质文明主要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各种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包括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和用品。精神文明如各种宗教、祭祀、占卜等，还有城邑、国家、政治、军事组织等。中国多为世界最早，或为中国特有，尚有许多信息未能查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开始改造自然，属原始文化，包括采集与渔猎食物。而到生产粮食，改造自然成立，人类文明时期开始。历史地理学是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中国历史地理学对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必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考

毛 曦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直至今天，研究范围不断拓展。^① 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历史地理学，也应是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历史地理学。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业已取得非凡成就，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但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极其有限，仍属极其薄弱的学术领域。不言而喻，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推进不仅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乃至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并积极参与全球国际事务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系统开展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已做出调整的新情况下，如何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做出响应，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不揣鄙陋，在梳理总结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就世界历史地理的学科问题及专业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提出粗浅看法，以做引玉之砖。

一 从周边到全球：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渊源与现状

“世界历史地理”，亦称“域外历史地理”或“外国历史地理”。从逻辑来说，与“中国历史地理”相对应，“外国历史地理”之称更为准确。而“域外历史地理”之称与“外国历史地理”接近，只是属于较为传统的用法。但若以我国目前的学科划分及其名称来看，历史学目前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大类，地理学也可分为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据此，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分为中国历史地理和世界历史地理。因此，“世界历史地理”之称与其他名称相比更为妥当。

我国对于世界历史地理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就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对此有一定的反映。秦汉以来，《史记》、《汉书》等一大批历史文献对于世界历史地理有着大量的记载。清朝康熙时期陈梦雷编辑完成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对明代及其以前各种文献资料的分类汇编，其中《方輿汇编》之《边裔典》设有 542 部，包括 140 卷，对中国

^① 毛曦：《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